

新中国初期新文化建设成就及其经验*

欧阳雪梅

[摘要]新中国初期的文化建设,确立了文化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主旨,保障了人民文化权益,形塑了文化建设的主体,培养了一批批时代新人,确立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及“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建设基本路径,繁荣发展了社会主义文化。新中国初期的文化建设取得了诸多成就:保障了人民的文化权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创作了许多新中国文艺经典、举全国之力实施大型文化工程、构建中国话语和塑造中国精神。形成的主要经验是: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是关键、发扬模范道德示范作用、建设人民的文化、“文贵创新”。进入新时代,我们要从既往的文化建设中继承有效措施手段,吸取经验教训,使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图伟业。

[关键词]新中国初期;文化建设;成就与经验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19)12-0051-08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就豪迈地指出:“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p.343)}“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p.345)}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2](p.9)}新中国成立后即据此展开新文化建设,确立了文化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主旨,形塑了文化建设主体,提出了建立“现代化的文化和科学”^{[3](p.24)}的发展目标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及“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建设基本路径,保障了人民文化权益,塑造了中国精神,构建了中国话语,建构了一个精神自立、文化自强、话语自觉的文化中国,为新中国,尤其是中华民族“站起来”提供了重要支撑,积累了丰富经验。

一、新中国初期文化建设的探索

(一)文化为人民群众服务

近代以来,中国战乱频仍、国弱民穷、公共文化设施短缺、文盲率高达为80%。^{[4](p.96)}1949年,全国仅有55个公共图书馆、896个文化馆(站)、21个博物馆,艺术表演团体1000个、场馆891个,^{[5](p.78)}而且多集中在大城市、口岸城市或省会城市。以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为例,在1949年之前,这座30万人口的北方城市,居然无一家电影院。新中国成立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文化水平这一艰巨的任务,摆在了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前。政务院下设文化教育委员会,作为国家领导文化教育建设的机构,指导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科学院、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的工作,并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文化领导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体制,为新文化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在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要求全中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6](p.525)}大会确立了新中国文艺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智库项目“中国共产党立德树人的思想实践及经验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欧阳雪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期间选举产生中华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联下属的美术、舞蹈、曲艺、文学、音乐、戏剧、电影等专业性协会也相继成立,并在地方设立分会,加强了文艺队伍的组织和建设,开启了发展新中国人民文艺的高潮。教育工作会议则确定了“教育必须为生产建设服务,为工农服务,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7](p.404)}培养“富有创造力和全面发展的新社会的建设者”。^[8]新中国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人民文化、人民文艺、人民教育:广泛建设公共图书馆、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站)、剧场以及广播、电影设施,活跃基层群众文化生活;发展新的文学、戏曲、电影、音乐、舞蹈、戏剧、美术、广播、报纸、杂志等社会文化事业;将教育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大力发展与各级各类学校相衔接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在各地开展识字扫盲运动和业余教育、各种专业培训,1958年实行全日制和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9](p.324)}实行文字改革,简化汉字,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等等,这些举措实现了文化群众化、通俗化,让大多数人都有了读书看报、看戏观影的能力。职工享有配发书报费与电影票补贴等福利制度,这也培养了城市居民“文化消费”的习惯。

(二)形塑文化建设的主体

在新中国初期,培养新人与改造旧知识分子同样重要。《共同纲领》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12](p.9)}的国民公德;在教育方针上,毛泽东提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0](p.226)}1951年,中共中央要求健全各级党委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迅速建立了覆盖全国、有效运作的宣传和组织网络,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亿万人民群众。中央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组织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全集,出版了《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亲自审定收录的文章,并为某些文章写了题解和注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得到宣传普及。同时,党和政府注重发展高等艺术院校、中等艺术学校,大力培养艺术人才;进行学校课程改革,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废除政治上的反动课程,开设新民主

主义的革命政治课程,借以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1]高校开设“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后改为“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课程。

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是爱国进步、具有建设新国家的愿望的,但是,知识分子中相当一部分受旧的思想影响较深,对共产党、新社会、新事物还不了解,思想感情上与劳动群众有隔膜,因此,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12](p.52)}帮助他们逐步成长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改造的途径和方法是读书学习,批评和自我批评。

思想改造运动从教育界开始,1951年9月初,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等12位知名教授发起北大教师的政治学习运动,随后推进到文艺界、学术界和整个知识界。郭沫若任主席的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成立,研究会的宗旨首先是“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13](p.4)}实行戏曲改革,改戏、改人、改制。国家明确规定以历史观点和爱国观点作为审查剧目的标准,旧有戏曲中一切有重要毒害的内容,及表演形式上一切野蛮、恐怖、残酷、猥亵、奴化的成分,必须革除。对好的剧目中一切健康、进步、美丽的因素加以肯定,继续发扬;对艺人加强培训教育工作,提高其政治、文化及业务水平;旧戏班社中的旧徒弟制、养女制等不合理制度,严重侵害人权与艺人福利,应加以改革,以剧团、剧场为基础,演出新剧目,改进管理,^①这类措施改变了大多数从业者颠沛流离、衣食无着的状态。此外,相关措施还包括结合土地改革、贯彻婚姻法,批判封建文化;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肃清帝国主义在华文化影响,展开反帝爱国运动,对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分别由国家接办或中国私人团体自办;^{[14](p.160)}批判奴化思想,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批判电影《武训传》的错误历史观,解决文艺工作者该怎样阐释历史以及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及胡风文艺思想等;1954年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社会学部,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等等。思想改造和学习运动帮助

^①参见《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文化工作文件资料汇编(一)(1949—1959)》,文化部办公厅1982年内部出版,第177—178页。

知识分子“掌握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由民族的、爱国的立场前进到人民的立场”。^{[7](p.408)}历史学界的陈垣、吕思勉、吴晗、罗尔纲、杨向奎、赵俪生和杨荣国等史学家纷纷撰文,畅谈与唯心史观划清界限,提高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问题能力的收获。杨荣国说:“就我们历史工作者来说……经过这一系列的运动与学习,大家都有极大的进步,立场、观点和方法都初步地改变过来,初步的以工人阶级的立场、唯物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来讲授和撰著历史了。”^[15]文艺工作者满腔热情地深入工农兵、了解工农兵、表现工农兵,文艺创作掀起“写人民、为人民、服务于人民”的热潮。在扫盲等文化普及活动中,男女老少都来学识字,出现了夫教妻、子教父、能者为师、有文化的都来教、没文化的都来学的感人场面。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教育更加系统化科学化,如宣传工作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语言,很有说服力地去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16](p.199)}

(三)提出文化建设方针,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党的八大明确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7](p.293)}把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确立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毛泽东提出了“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18](p.574)}他多次申明这个方针是一个基本、长期的方针,并强调“双百”方针是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相统一的,“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10](p.197)}“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毛泽东提出,我们不仅“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19](p.225)}而且“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10](p.41)}我们应该学习借鉴外国好的东西,“要用外国有用的东西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18](p.607)}文化部设置文物事业管理局,逐步建立了文物保护制度。1958年2月,党和政府在国务院科学规

划委员会下设立古籍整理和出版规划小组,负责全国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并制定了古籍整理出版的长期规划,分门别类地整理古籍。

中国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例如1951年4月,中国与波兰签订《中波文化合作协定》。与此同时,我国还与亚洲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建立和发展文化友好关系,与日本、西欧等国家逐渐开展民间文化交流。除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外,还进口社会科学、科学技术类书刊,服务国家建设。从1949年10月到1955年12月,共计翻译出版各国书籍12155种,18853.8万册。其中苏联的有10017种,人民民主国家有620种,美国的562种。^[20]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译成中文后,一版一次就印行50万册,后来多次再版。《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印数曾分别达到134万册和124万册。^{[21](p.416)}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作家创作的充满革命激情和乐观主义精神的作品,成为当时中国人的精神食粮之一,鼓舞了人们战胜困难的信心。此外,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与西方的文化交流逐渐扩大。

二、新中国初期文化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

(一)保障了人民的文化权益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当时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1953—1957年五年文化事业费总投入为4.97亿元,1978年当年增加到4.44亿元,^[22]文化设施大为改观。到1966年,全国有公共图书馆523个、文化馆(站)4846个、博物馆193个,^{[5](p.78)}基本上普及农村广播网。全国文盲率由1949年的80%,下降到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3.58%和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22.81%。1978年全国适龄儿童小学净入学率达到95.5%,小学毕业生入学率达到87.7%,高校毕业生累计139.2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累计211.1万人,^{[5](pp.72-76)}分别为新中国前七年的4.7倍和2.4倍,培养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

同时,党和政府将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作为国家工作中的一项重大任务,在中央、西南、西

北、中南、贵州、云南等地建立民族学院,大力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创制和改革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例如,在地广人稀的内蒙古牧区也出现了像“乌兰牧骑”这样的红色文化工作队。雪域高原上的西藏建立起了第一所民办小学、第一所夜校、第一个识字班、第一个电影放映队,^[23]改变了自身文化主体:西藏和平解放以前,藏族文化是一种以拉萨为核心、以政教领袖为主体的精英文化,藏族僧侣阶层和贵族受到良好教育,把持着藏族社会的话语权。新中国成立后,农奴、农牧民、猎人、手艺人、军人等普通藏民作为文学形象逐步走入文学殿堂,为藏族文化带来了清新的空气,同时藏族语言文字也得到了保护和发展。

(二)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不仅许多知识分子逐步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而且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立了起来。哲学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方法研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纲要》等哲学教材,并在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普及,强调让哲学变成群众手中的武器,由此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启蒙教育运动,形成了“学哲学用哲学”的文化氛围。

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历史学界在批判封建旧史学与资产阶级史学的基础上,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内百家争鸣的全新局面,提出并讨论了许多重大史学命题,如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和汉民族形成等五个重大史学理论问题(称为“五朵金花”)的研究、讨论和论争。此外,还有“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以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关系问题等重大史学理论问题,这些对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探讨及研究的成果,成为人们深入认识中国历史的依据或参考,说明史学工作者从朝代史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在整体上提高了史学界的学术水平,对新中国历史

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①周谷城出版了《世界通史》,旗帜鲜明地提出:“欧洲通史并非世界通史之中心所在”。^{[24](p.1)}他通过对尼罗河流域文化区、西亚文化区、爱琴文化区、中国文化区、印度文化区、中美洲文化区等六大古文化区的阐述,努力凸显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明的特征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否定了“欧洲中心论”。吴于廑在1964年提出了“整体史观”思想,他说:“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无疑必须体现世界的观点。所谓世界观点,是针对地区或种族的观点而言的。它应当排除地区或种族观点的偏见,全面而如实地考察世界各地、各国家、民族的历史。”西方史家从不把“落后的非欧洲”写进史书,如果写,“也是用以反衬欧洲的文明和进步”。^{[25](pp.3,8)}

“马克思在经济史研究中抽象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一系列经济学理论,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加适合于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指导,更加具有方法论意义,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史学家,对此更易于接受,并心悦诚服地运用于经济史研究之中。”^[26]唐长孺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跋语中指出,“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27](p.448)}傅衣凌也表示,“解放后,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研究的信心增强”。^{[28](p.47)}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以及在倡导科学研究的氛围下,经济史研究成就硕果累累。如李剑农等重新编写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和《宋元明经济史稿》由三联书店出版,成为最早的中国经济史多卷本著作和各高校的参考教材,其权威性为学术界所公认。彭雨新在该书1991年的“再版前言”中称:“全书着重阐述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在对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变化的说明中,著者十分重视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关系。”^{[29](p.1)}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还有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6)、《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1957)、《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

^①参见瞿林东:《传播·反思·新的前景——新中国70年史学的三大跨越》,《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4期;于沛:《批判与建构:新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

(1957),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1957)、《明代的军屯》(1965),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1962),王亚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1954),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1955)、《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1957)、《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1959),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1958),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1962),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度》(1957)、《北朝经济试探》(1958)、《南朝经济试探》(1963),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中册,1962、1963)等,这些著作也填补了经济史研究的空白。^[26]

(三)创作了熠熠生辉的新中国文艺经典

文艺工作者满腔热情地深入生活,创作了一大批表现人民群众改天换地创举的雅俗共赏的艺术精品。如1959年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是西方交响音乐民族化的典范。1964年9月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更是“洋为中用”文艺创新的巅峰之作:借用西式舞蹈、音乐技法,其思想内容和风格则完全是中国民族化的。同时,文艺工作者还创作了一大批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如《新儿女英雄传》《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风云初记》《苦菜花》《青春之歌》《三家巷》《红旗谱》《红岩》《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如《青春之歌》1958年出版时就连续6次印刷,共印刷了39万册;《林海雪原》1957年出版,到1961年已累计发行100多万册。^[30]《红岩》发行量超过千万册。音乐作品有《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北京的金山上》《翻身农奴把歌唱》《长征组歌》等。在中国画领域,产生了《把学习成绩告诉志愿军叔叔》《婆媳上冬学》《转战陕北》《八女投江》《群英会上的赵桂兰》和林风眠的彩墨仕女和善良的简笔戏曲人物等优秀作品。^[31]以《一支驳壳枪》《小兵张嘎》与《渔岛怒潮》等为代表的各种畅销连环画更是销量惊人,1949—1965年间,全国共出版一万多种连环画,总印数约2.6亿册。^{[32](p.208)}

民族传统戏曲艺术遗产的整理和革新取得了不小成绩。截至1957年4月,全国在挖掘传统剧目方面,开列出名目的有51867个,已有

文字记录的14632个,经过初步整理的4223个,已上演的10520个。^{[33](p.43)}戏曲工作者创作出一大批新编历史剧和用传统形式表现新时期的人物形象的新戏曲。如京剧《海瑞罢官》《穆桂英挂帅》《赵氏孤儿》《碧波仙子》《白毛女》《杨门女将》《谢瑶环》《九江口》;越剧《则天皇帝》《红楼梦》《文成公主》;粤剧《李文茂起义》《关汉卿》;沪剧《星星之火》《鸡毛飞上天》;豫剧《冬去春来》《破洪州》《卷席筒》;川剧《夫妻桥》《和亲记》;湖南花鼓戏《生死牌》《打铜锣》《补锅》;黔剧《秦娘美》《奢香夫人》;吕剧《姊妹易嫁》、评剧《金沙江畔》、彩调《刘三姐》、昆剧《墙头马上》等优秀剧目,其中许多佼佼者成为久演不衰的经典剧目。

(四)举全国之力实施大型文化工程

1953年《新华字典》第一部出版(迄今11版)。1956年6月,标点本《资治通鉴》正式出版。1957年开始修订《辞海》,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的综合性辞典,以政治性、科学性、通俗性、知识性、稳定性、正面性等为修订原则。《辞源》修订版第一册1964年7月出版发行。同时,《汉语大字典》《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二十四史》(点校本)《清史稿》《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华大典》《大中华文库》等陆续出版。此外,还出版了《全唐诗》《全宋词》等一批古代文学、历史、哲学方面的典籍和资料书;影印了《太平御览》《永乐大典》等古籍,既方便普及传统文化,也推动了文史学术发展,保护了少数民族文化艺术。

(五)构建中国话语和塑造中国精神

近代以来,由于封建制度腐朽没落,中国这个昔日东方大国渐渐落后于西方列强,西方国家向中国倾销鸦片,使国人“双管横陈,何人对拥无眠”;^{[34](p.356)}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之下,中华民族不仅因落后而挨打,也因落后而失去了话语自信、文化自信。在西方话语中,中华民族成了劣等民族。黑格尔曾武断地认为,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东方文明是人类历史的童年,属最幼稚、最低等级的文明。^①中国人被冠以“东亚病夫”,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抱着负面评价的态度,认为中国人不仅体质低下,而且精神上奴性、胆怯、自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华民族走向复

①参见王绍光:《回望1840,今天为中国精神重新编码》, https://www.guancha.cn/WangShaoGuang/2019_09_01_516034.shtml。

兴的伟大历史开端,也是中国话语走向世界的伟大历史开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建话语,在天安门广场竖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他亲自起草碑文,把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牺牲的先烈,悉数纳入“人民英雄”之列,致敬“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些为中华民族掌握自己命运、开创民族发展新路而英勇献身的人们,是民族英雄,是国家荣光,照亮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立碑纪念,不仅缅怀先贤烈士,同时尊崇劳动者,表彰劳动模范,致敬功勋楷模。每逢重大节日,党和政府就把他们请上天安门城楼,与党和国家领袖一同观礼,这奠定了人民与国家的良好关系。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无数作家、艺术家充满深情地歌颂国家的伟大和祖国儿女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塑造志愿军无畏、自信之师的形象,歌颂“最可爱的人”,激发军队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以此支援前线、支持军队。报告文学《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表现了新社会人民之间的友爱之情,《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塑造了中国人民的攀登精神,《让我们荡起双桨》表现了孩子们在阳光下快乐成长,《我为祖国献石油》展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者们的豪迈,《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体现了56个民族相亲相爱,《祖国颂》充满了当家作主的豪情,《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表达了新中国少年儿童的心愿,《英雄赞歌》凝聚着中华儿女的英雄情结,等等,^[35]这一首首歌声,不仅使中国艺术由宫殿艺术、小众艺术、文人艺术走向大众,更让世界感受到中国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概。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迸发出极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展现出极大的生机与活力。梁漱溟先生在1950年国庆时写下《国庆日的一篇老实话》,说“可喜的新气象到处可见,具体事例数说不完”。以前“大多数是混饭吃,混一天算一天,其他好歹不管”,“今天不然了。我走到各处都可以看见不少人站在各自岗位上正经干,很起劲的干,乃至彼此互相鼓励着干,有组织配合地干。大家心思聪明都用在正经地方。在工人就技艺日进,创造发明层出不穷。

在农民则散漫了数千年,居然亦能组织的很好。这不是活起来,是什么?”^[36]1955年9月至11月,萨特和波伏娃访问中国,10月1日他们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新中国成立6周年的庆典。1955年11月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萨特《我对新中国的观感》:“我特别想到这种值得钦佩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这种精神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落在中国的头上的,而正是你们在前进中产生的果实,也就是你们继续前进的必要方法。在缺少学校的情况下,每一个识字的中国人都可以去教另一个中国人。”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高涨,涌现了一批如焦裕禄、王进喜、雷锋式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优秀党员干部,形成了大庆精神、大寨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红旗渠精神等。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成为时代最强音,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尚焕然一新。

在国际上,新中国通过发展自己更好地造福世界。毛泽东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0](p.157)}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划分等,就是当年中国话语对国际话语体系的贡献。虽然自身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中国仍然义无反顾、真诚无私帮助支持“第三世界”的亚非拉朋友以及与中国友好合作的世界各国朋友们。正是如此,中国走过泥沼,“站起来”了,以自信、聪明、智慧、坚韧的形象,替换了曾贴在自己身上的羸弱、贫瘠、畏惧和臣服等标签,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三、新中国初期文化建设的 主要经验

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主要依靠国家力量将文化事业置于行政体制当中运作,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各项文化事业被纳入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之下,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积累了经验与教训。

第一,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是关键。党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结合时代要求、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提出文化纲领、文化

发展目标、文化政策,把握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建立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文化治理。党发挥了政治领导、思想引领、制度安排、社会动员等重要作用,这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开拓创新的根本保障。

第二,发扬模范道德示范作用。刚成立时,新中国“一穷二白”,因此精神与道德的示范、激励尤为重要。在思想改造中,中国共产党强调人人都是自我改造的主体,领导干部首先要过“思想关”,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座右铭。因为“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时代是不断前进的,思想改造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不落伍,跟得上时代,时时前进”。^{[37](p.423)}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怀着忧患意识和“赶考”情结,始终保持革命劲头,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的克己、奉献精神在文化领域引领全社会形成敬仰英模、学习英模的崇高风尚。被张扬的英雄人物的爱国、奋斗、奉献精神,鼓舞、激励着中华儿女克服各种困难、万众一心、自强不息、一往无前,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自豪感不断增强。

第三,建设人民的文化。新中国坚持文化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建设服务,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又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文艺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毛泽东把老舍反映新旧社会对比的话剧《龙须沟》请进了中南海怀仁堂。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辞去了陕西省长安县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集中精力创作经典史诗之作《创业史》。文艺创作者深入生活,面向基层、面向群众,不仅以真诚和热血创作了受群众欢迎的文艺作品,也哺育了一批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大家。人民的文艺所表达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对人民群众产生了一种感染、教育和召唤作用,在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的欺凌中刚刚站立起来之际,无疑具有伟大的积极意义。^[38]

第四,“文贵创新”。社会主义文化借鉴和利用了許多喜闻乐见的传统与现代样式。如

革命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把中国传统文学的传奇性方法,与新时代的革命英雄主义结合起来,作为一种美学追求来反映和揭示生活,塑造了鲜明、生动、丰满的艺术形象,以表达时代和人民心声作为正道,极大提高了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的艺术品位,使之具有了无法比拟的传奇色彩和浪漫主义特色,这些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后来被称为“红色经典”,实际上为当代中国文学奠定了基调。^[30]新中国画家则提倡“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发掘、弘扬中国的民族文化,写实水墨人物画,在素描与笔墨或彩墨的融合方面积极探索,在题材上进一步贴近现实社会。^[31]历史学家在继承中国古代史学求真致用的优秀传统以及近代新史学寻求现代性的现实关切的基础上,形成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格局。苏联文学、美术、舞蹈、音乐,戏剧创作的理论、形式和技术手段,电影创作的蒙太奇理论和技巧等等输入中国,丰富了中国文化的样式和审美观念,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也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新中国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外国优秀文化进行整合的基础上,塑造出社会主义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后,人们批评这一时期文化与政治靠得太紧,文化多样性不够,但应该看到中国当时文盲占绝大多数、一盘散沙的历史背景,且当时中国社会形态更替,以维护民族主权和国家安全为最高目标,在东西方意识形态严峻对立的冷战形势下,文化及文化艺术工作者被赋予了除旧布新,维护文化安全,传播社会主义新文化、宣传社会主义新观念、教育社会主义新人、服务于国家建设的目标与使命,是断不能鼓励其放任自流、浅吟低唱、自娱自乐的。当然,新中国初期的文化建设是在对旧文化的批判中建构起来的,要划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清除和批判文化领域内的唯心主义思想,而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庞大的、完整的科学体系,人们要在短时间内学懂它和正确地运用它不容易,因此也存在对马克思主义某一论点或断语的夸大和误读,导致教条主义和简单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这就使得具体

的历史研究在运用理论时,往往忽视了特定的语境和研究对象的差异,这种理论的泛化导致了历史研究的教条化、理解上简单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对此,我们需要从既往的文化建设中继承相关有效措施手段,吸取经验教训,使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图伟业。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4]国家教育委员会成人教育司编.扫除文盲文献汇编(1949—1996)[M].成都: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 [5]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 [6]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 [8]钱俊瑞.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J].人民教育,1950,(1).
- [9]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10]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1]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J].人民教育,1950,(5).
- [12]欧阳雪梅.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1949—2019)[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
- [13]中国史学会秘书处编.中国史学会五十年[M].北京:海燕出版社,2004.
- [14]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 [15]杨荣国.史学工作者的任务[J].历史教学,1954,(2).
-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19]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0]丁西林.十年来中外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N].光明日报,1959-09-24.
- [21]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上)[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 [22]文化事业繁荣兴盛 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八[EB/OL].http://www.gov.cn/xinwen/2019-07/25/content_5415076.htm.
- [23]胡星.西藏民主改革50年 社会生产力实现三次历史跨越[EB/OL].http://www.gov.cn/jrzq/2009-03/19/content_1263172.htm.
- [24]周谷城.世界通史(第1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0.
- [25]吴于廑文选[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 [26]陈锋.与时代同行:中国经济史研究70年[N].光明日报,2019-11-18.
- [27]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28]傅衣凌.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29]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1卷)(先秦两汉部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
- [30]贺绍俊.当代文学的“洪钟大吕”[N].文艺报,2019-07-08.
- [31]于洋.笔墨延展与时代新象——新中国70年中国画发展历程回眸[N].中国文化报,2019-09-01.
- [32]陈矩弘.新中国出版史研究(1949—1965)[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 [33]当代中国戏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 [34]汪廷奎,茅林立.林则徐读本[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5.
- [35]韩新安.奋进的音符 多彩的乐章(逐梦70年)[N].人民日报,2019-10-09.
- [36]梁漱溟.国庆日的一篇老实话[N].人民日报,1950-10-02.
- [37]周恩来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38]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的探索道路[N].文艺报,2019-09-27.

责任编辑:顺宇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o Feng-jing and Wang Feng-zhi)

On the New Culture in the Early Period of New China: Its Construction, Achievement and Experience: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PRC defined the main purpose of culture serving the masses, guaranteed the cultur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nd shaped the main body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It also cultivated the new generation of the times, established the policy of “letting a hundred flowers bloom and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and the basic path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putting forward the new”, “making the past serve the present and making the foreign serve the Chinese”, and prospered and developed the socialist cultures.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PRC include safeguarding the people’s cultural rights and interests, establishing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creating numerous new China’s literary classics, carrying out large-scale cultural projects with national strength, constructing Chinese discourse, and shaping Chinese spirit. The main experience refers to adhering to the key role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cultural work, carrying forward the exemplary role of model virtues, cultivating the people’s culture, and attaching significance to cultural innovation.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inherit effective measures and methods from the past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so that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the country can work together with one heart and one mind to build the grand cause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Ouyang Xue-mei)

The Development of Party Member Standards in the Past Seventy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arty’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The past seventy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witnessed dramatic changes of the CPC, while improving the standards of Party members has always been the core issue of party construction,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the vanguard nature of the Party,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fulfilling the Party’s historical mission, and the inevitable response to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Party’s political advantages. Throughout the development of party member standards in the past seventy years, it is the utmost for the Party member to adhere to the political belief, namely the CPC is a Marxist party which takes communism as the ultimate goal. This is the Party member’s highest value pursuit and unshakable spiritual support; the party member should stand firm in the political position of the proletariat and the people; the Party member should have a distinctive political attitude or fundamentally the for-the-people emotions and thoughts; the Party member must have the political virtues of a Marxist political party which represent the direction of China’s advanced culture and lead the values of social trends. (Xiong Qiu-liang)

The Studies on On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in the Past Seventy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A Review and Their Prospect: The year of 2019 is not only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but that of the publication of Mao Ze-dong’s brilliant work *On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In the past 70 years, domestic researches of the book mainly involves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great significance, important connotation,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contemporary value and many other aspects. Nowaday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It requires us to continually deepen the study of Mao Ze-dong’s classic works by interpreting the texts in the specific 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at that time, enhancing the researches on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On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by Xi Jin-ping thought of state governance for a new era, a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with different perspectives. With new angles and new methods, we should widen and deepen the studies of *On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in the new era, instead of having them “marginalized” and nihilism. (Tao Lin)

On China’s Plan for Marine Peace,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Ecological Development: Studying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Marine Issues: As a rising world power, China is in a cr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marine pattern, facing many key issue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Xi Jin-ping has delivered a series of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marine development. He clearly proposed that China must adhere to the road of marine development with peace,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ecology, and contributed China’s plan for realizing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oceans. Rooted in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ew international marine order, the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at China’s marine cause is faced with, and the theories of marine development by previous party and state leaders and leading groups, the proposal of the plan forms an overall pattern with three important theoretical pillars, namely building a marine power, co-building a marine Silk Road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the oceans, and embodies three core contents of peaceful marine development, the maintenance of marine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protection of marine ecology. Thi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ine cause, guide its direction, and gather consensus on marine governance. (Chen Qi)

I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agmatic?: A Review of Foreign Scholars’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pragmatis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brilliant achievements of the PRC in the past seventy years have attracted the worldwide attention. Foreign scholars have paid attention to and studied China, among which pragmatic interpretation is a representative argument. Fundamentally, the perspectives of this kind misinterpre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long with utility principle as the premise and effect principle. Pragmatism, as well as utilitarianism, is a harmful, rather than benefici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e of our party and state. All previous leaders of the party and state have rejected and opposed pragmatism. That some foreign scholars regar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pragmatism rather than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ultimately lies in their failures in discriminating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We oppose dogmatism within the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practice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and the practice of the socialist cause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which is essentially different from indiscriminately emphasizing effect and effectiveness under British and American pragmatism. We should adhere to and develop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a more clear-cut stand, instead of any other doctrine. This is a critical matter concerning contemporary theoretical confidence. (Zhao Ming-qi and Zheng Guo-yu)

(翻译:张剑锋 刘莹莹)